

从阿巴斯王朝传到南宋的故事

孟晖

南宋文人记载了听闻的一则轶事，然而，在时代更早的阿拉伯史书中，已然出现了梗概相同的故事，这样的事情谁能想到！

几年前，我注意到中国传统酒具中有一种酒杯，且称为“显影杯”。那种酒杯当杯中无物的时候，杯底没有任何图案，然而，一旦注入液体，杯的底面上便赫然显示出鱼、蝴蝶、美人等影像，有如变魔术一样。

戴念祖先生《文物与物理》“透光镜之谜”一文为我们破解此般酒杯的神秘：古代工匠是巧妙运用了光学原理，在杯底上加装一个凸透镜，即一片球面的水晶片或透明玻璃片，在镜底与杯底之间则水平地夹置一页图画，画面上描绘鱼、花卉、美女等任意选定的图案。当空杯时，夹嵌图画在焦点之外，图画的身影在人眼一侧为实像，人眼不易看清，结果就造成了杯底无物的幻觉。

一旦将酒或其他饮料注入杯内，由液体形成了一个凹透镜，与固定在杯底的凸透镜结合成为一个凹凸相接的复合透镜。这时，嵌画进入复合透镜的焦点之内，其成像是杯底一侧的放大的虚像，人眼可以清楚看到。待到杯中酒饮尽，复合透镜自然解体，放大的虚像也随之湮灭，人眼便看不到嵌画上的形象了，这就让人感觉像是杯中的形象忽然消失了一样。

从文献来看，传为五代陶穀所著的《清异录》“盞中游妓”一条，是时代最早的相关记录。从那以后，历代都有零星的记录，一直延续至今（可参见本人《鱼影杯与蝴蝶杯的秘密》一文）。

南宋文人王明清《挥麈后录》里记录了一则“往事”，是以有同样奇幻效果的宝器为引子，情节却特别黑暗。事情的过程颇为复杂，大致是：

北宋宣和年间有个茶叶商人郑良，通过巴结太监，居然把“广南转运使”这样一个肥差搞到手，成了负责广州进出口业务的高官。广州的一家富户拥有一件宝物，是个玛瑙盆，“每盛水则有二鱼跃其中”。郑良想出高价买下那盆，但富户却把它卖给了一位“蕃舶”——拥有海船、从事印度洋贸易的外国商人。这位商船主虽是异域血统，却起了汉名，叫曾讷。从通篇情节可知，他与包括兄弟在内的家人定居广州，对中国的法律、制度甚至政治形势

笔会

谈艺录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

那日，她去被称为日本绘本之

都很熟悉。郑良便向曾讷讨要，后者编个借口推脱说，玛瑙盆已经进献给宋徽宗了。没想到郑良借题发挥，上奏朝廷：曾讷私藏宝物，奢侈程度借越天子。宋徽宗降旨追究，在郑良罗织之下，曾讷家族覆灭，他本人亦遭流放。到了靖康元年，宋钦宗即位，曾讷获得赦免，他意识到此时是翻盘的时机，便进京击鼓鸣冤。结果监察御史陈述明原本奉旨追诛蔡攸，宋钦宗便让他代替郑良的职务，并对后者展开审讯。陈述明趁机对郑良严刑逼供，导致其身亡，棺木停放在佛寺里。不久，陈述明不法行为暴露，贬官赴职途中，到佛寺内借宿，居然撞见了郑良的棺木，惊吓之余发疯嗚呼。于是，他的棺木被停放在郑良棺木之旁，二者相伴，长久无人来认领安葬。

事件的信息量很大，其重要背景之一乃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广州作为印度洋贸易中最大的港口之一，成了悲剧的舞台。出场人物都极有特色，当了进口贸易专员的茶商，深谙宋朝国情的异国巨商，权势无限的太监，阴险残酷的监察特使，这四人在人物设定上的张力，简直像是欧洲戏剧鼎盛时期的舞台角色，精彩地完成了现实主义对“典型人物”的要求。他们上则是蔡京父子、宋徽宗、宋钦宗，像是背景上的影子，影响着前台人物的一举一动。王明清的笔调很清楚，一则是展示宋徽宗的昏聩无道，展示北宋末年政治腐败，恶人当道。二则是以佛家的态度，叹息人命受制于物欲控制，受恶念驱使，叹息命运无常，一切终归荒凉。

王明清笔下，整顿事件过程完整，出现其中的人物都有名有姓，而且与具体的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显得是一桩真实事件。然而，奇妙的的是，阿拉伯史学家马苏第《黄金草原》讲了类似的事情。

马苏第是公元十世纪上半叶的旅行家和史学家，出生在阿巴斯哈里发王朝的首都巴格达。他留存至今的《黄金草原》是一部恢弘的世界史，气势撼人。该书第十五章详介中国，其中用很长篇幅讲述了一则传说，大致是：

撒马尔罕的一位商人携带大量货物南下到达巴士拉，然后乘船航行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中国“国王”特派的太监传见外国商人，他出的报价，那位撒马尔罕商人认为太低，于是发生了激烈争执。太监就下令对他折磨虐待，强迫他接受低价。而商人立刻动身前往西安府申状。接下来的情节将中国描绘得十分理想化，还充满具体细节。总之，国王召见了商人，又命令宰相等高级官员分别了解广州方面的实情，最终召回太监，解除他的职务并给以惩罚。然后国王恩赐撒马尔罕商人，让他回广州，并且允诺：如果商人出高价出售他的物品给国王，则龙心大悦；如果商人想要留着商品自行出售，也随他的意；只要商人愿意，就可以居留或者去他想去的地方（耿昇译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82-184页）。

可以看出，马苏第记录的撒马尔罕商人的遭遇，与王明清笔下的曾讷故事，主要情节一样，都以广州为事发地，都有异国商人奔赴京城告御状的关键环节，还都告成功了。中国君主亲自下圣旨追查案情。但两位作者的心思却截然相反，马苏第的用意是介绍，在唐末的乱世之前，中国的“古国王们有着一套正常的治国制度，在他们所作的公正判决中受理智的支配”。他呈现的中国，简直罩着梦幻的玫瑰色。

但，不管怎样，在阿拉伯世界的史学巨著中记录过的传闻，竟然又出现在中国文人的笔记里，而且前者早在十世纪上半叶，后者则是到了十二世纪，中间差了二百年。这一情况说明，中国与中东地区的文化交流远比我们所知的更为活跃，更为丰富，文明在亚洲大陆上发展，也在亚洲大陆上流动，相关的研究有着广阔的空间等待开拓。

冬日的一个午后，我去巨鹿路675号上海市作协，参加“禾洋都林杯”征文颁奖会。这座百年花园洋房，当年曾请匈牙利人鄒达克设计，至今仍能体味其格局，但终究老迈了，四处呈现岁月存留的斑驳。包扎好的书册杂志从室内蔓延至厅廊道。在办公楼的门墙上，我看到了几块色泽有些暗淡的铭牌。左上第一块为“中日儿童文学艺术交流上海中心”，不由驻足凝视。沉寂已久的往事顿时被勾动起来。

三十多年前的1989年盛夏，我第一次来到巨鹿路675号。那是应邀参加一个青年作家座谈会。主办方就是这个“交流中心”。记忆中，张锡昌、陈丹燕、秦文君、郑春华和任大霖等沪上儿童文学界的代表人物都参加了的。日方代表是翻译家中由美子女士。彼此没有任何语言障碍，大家的交谈自然而愉快。儿童文学没有国界——安徒生不仅属于丹麦，格林兄弟更不仅仅属于德国，盖达尔不仅仅属于俄罗斯。他们的许多不朽之作，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由美子女士穿一袭白色连衣裙，乌黑的头发自然垂肩。略施粉黛的脸上，充满热情、友善、谦和的笑容。那时她是厚生省自立指导员、兵库县生活相談员，热衷于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作家的作品。我在《儿童时代》杂志也读到过她推介的日本作家的散文。她说，她甘愿当一个文坛“二传手”，译介的大多是经得起时间筛选的作品。这些作品，同样应该属于全人类。

那天3月，她与被称为日本绘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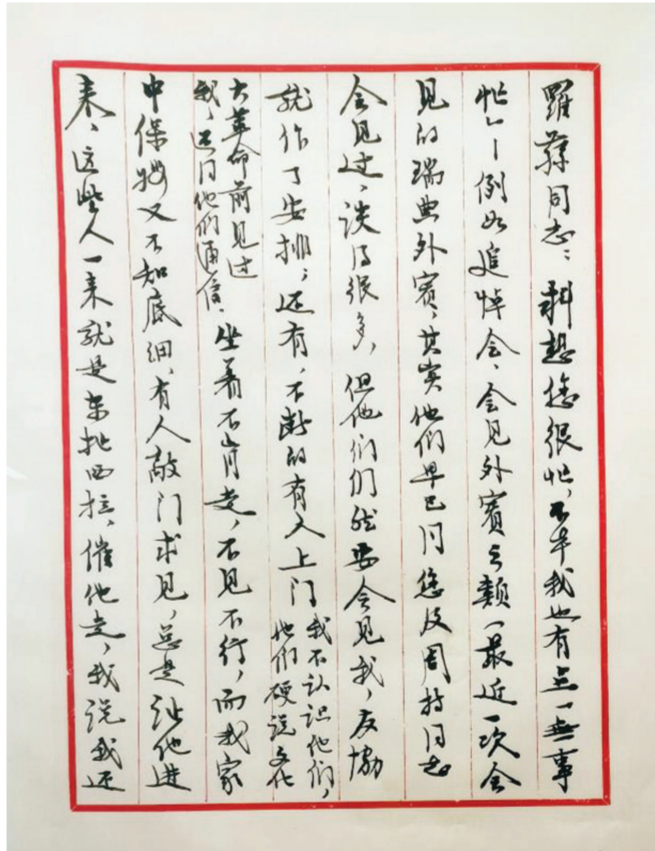
墨影留香：观茅盾手迹展

史宁

去年京城文博圈有好几个重量级的特展，一个是“华夏之华——山西古代文明精粹”展，还有一个“栋梁——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文献礼”，都在朋友圈里造成了刷屏的热度。我没有凑这个热闹，反倒去看了现代文学馆在年末新推出的纪念茅盾诞辰125周年手迹展。相比前两个大展的火热与人满为患，静悄悄的茅盾手迹展难掩冷清。不过，文学馆的展览一贯小众，况且作家手稿展更需要静寂和缓地作沉浸式欣赏，丝毫的喧扰都会破坏那一纸纸墨迹营造出的闲雅逸韵。每次赶上这样的观展环境，心中都倍加庆幸感恩。

今天仍然品读茅盾的入恐怕越来越少了，他的手稿必鲜有问津，这个展览究竟能吸引多少人专程前来观展实在未知。其实年末才推出纪念茅盾诞辰的手迹展似乎有些迟了，如果放在7月4日茅盾生辰前后或许更为恰当。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潮湿的江南水乡孕育了茅盾骨髓里的灵秀和俊逸。至今人们仍能在其个人纪念馆内有幸领略这位文学巨匠小学时留存的作品。那是旧式私塾教育留下的策论遗风，也是茅盾迄今最早的墨稿。这些文稿除了作文字工整的小楷和文末老师充满赞赏与厚望的评语之外，通篇老师的圈点评注像极了古人读书时做的笔记，形象地诠释了可圈可点这个成语。这次展出的茅盾手稿，大约十之八九全是用毛笔由右向左竖行书写而成，年少时的墨笔书写习惯一贯贯穿了茅盾一生。

深入了解一个文学家，作品仅是其中一方面。其生平、照片、手稿和生活场所都十分重要。出版作家文集时往往在书前卷后都少不了附上作者照片、手迹以及年谱，几乎成了惯例。读者需



作协门墙上的一块铭牌

陈益

福的家庭。中由美子和她的朋友们创办了一本翻译儿童文学杂志《世界的子供たち》(《世界的孩子们》)，重点介绍亚洲特别是中国作家的作品。依靠不倦的努力和社会资助，从1983年开始到现在，始终没有间断过。记得有一次，中由美子为翻译我的散文《十八双鞋》，从日本飞往上海，又请张锡昌、陈丹燕两位陪同，专程来我家商谈译本细节。因为那是一篇描写母爱的纪实散文，她希望见见我母亲。在我母亲告别时，她居然看中了一只杭州篮，请求母亲作为礼物送给她。我当时颇有些不解，如此普通的竹篮子，也值得带上飞机吗？如今，竹篮子也成为我们的稀罕之物，街头再也看不到劈篾编篮的竹匠，我终于领悟，她是在竹篮中寄托了一种怀想。

回到日本后，她在翻译过程中又专门打电话来，核对该几个细节。这样的一丝不苟，实在令人感动。除了《十八双鞋》，她还翻译了《禁区》《没有桅的小船》等多篇散文，发表于《世界的子供たち》。

茅盾最佳的一种生活方式。本次手迹展中展出了茅盾小说扛鼎之作《子夜》的手稿首页。稿纸是用36行竖写稿纸，每行约36字，字迹清秀，通篇一丝不苟。在原文为《夕阳》的稿纸上不乏作者涂改和修正的痕迹，能看出书写者的字斟句酌和精雕细刻。这种手稿可以供人们对比作品定稿前后间的差异，从中窥探作者写作时思路的演进变化轨迹。不过这是专业研究者的工作，对于普通参观者似乎无法轻易领略其真正价值，好在展览中数量最多的是书信手迹，从中能直观感受到茅盾和朋友间的深厚友谊。相比小说手稿的落笔审慎，这些书信手迹几乎都下笔成章，绝少修改，背后能够看出书写者的意趣和闲情，似乎信纸对面就是友人一副久未谋面的慈眉善眼。展览中惹人注目是茅盾1956年5月写给作家柯灵的一封信（下图左）。书信内容如下：

柯灵同志：

承惠赠大作《遥夜集》，谢谢。兹附书作一本，聊以为投琼之报。敬维纳纳。此颂健康。

沈雁冰

一九五六年五月

全信仅五十余字，更像是一张便条，放在今天一个手机短信就解决了，而茅盾偏偏选用了一幅菊花笺纸，工整娟秀地书写信文。之所以这一纸书简令人瞩目是花笺和信札的结合令人回想古代文士赠唱酬往来的遗风。花笺独特的质地、纹理、色彩既是书信手迹的承载者，其自身也是一件艺术精品，再加上墨笔文字的增华，真是清雅到骨子里。老派文人之间的情义联结在过去多半是靠着一封封来鸿去燕，正所谓纸短情长，再远的山水阻隔藉由一纸书信便能维系始终。维系之中常不乏互赠书作，双方都讲究礼尚往来，以自家的拙作回赠对方的大作。这种“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的文人礼俗

现今仍有沿袭，只是意蕴大减。电子邮件虽然快捷却难有一纸书信上的温度和气韵，更难见书写者的修养与襟怀。中国历来均有“以信为文”的传统，古文中《报任安书》一类的尺牍文体数量相当多。近代文坛也常有“以函代文”的风习，这便使得民国一代的知识分子特别注重鱼雁往还，乃至许多时候书信胜过了见面交谈，也胜过更先进的电话电报。展览中另有一封茅盾1978年写给孔罗荪的书信颇有趣味（下图右）。此趣味并非来自内容，而是来自书信体例。信中茅盾陈述自己生活中每每被各路访客打扰的苦衷，信札手迹在竖行正文之间忽而中断加上了两小列按语作为补充。这在今天许多没有浏览过直排古籍文献经验的年轻观众眼里是十分陌生的写法。全信既有引号括号这种西式文体中说明功能的标点，同时兼有古代文言文文中补充说明功能的按语，实在很有意思。茅盾那一代五四文人，纵使接受了再多西洋文明的浸润，骨子里也难逃幼年私塾教育灌输的孔孟诗礼，到暮岁写信仍然丢不掉那一套中华传统行文的规矩。这是一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书写习惯。书信行间的小楷这时也越看越有韵味。茅盾曾在1979年给陆蠡存的一封信中自评书法。他说：“我的字不成什么体，瘦金看过，未学，少年时曾临董美人碑，后来乱写。近来撰写书名、刊物名者甚多，推托不掉，大书书写，都不名一格。”言语间又满是自谦之词，茅盾的墨字细观之下确能见出瘦金体的影响，加上《董美人墓志》的精习，其书法娟秀瘦硬，晚年愈见风骨。

年近迟暮搬进后园恩寺胡同的茅盾已然成了众人文口中口的茅公，宽敞疏朗的合院内的生活日渐单一。无官身轻，茅盾也不事花草养不近古玩，甚至拒绝体育锻炼，每天除了在后院居室内踱步便是读书写字，他开始了人生最后一部大书的撰写，便是始终念念不忘的回忆录。展览中最后部分也陈列出茅盾写作回忆录的部分手迹。只是这时的稿纸宽行疏疏，书写者也一改传统变成了硬笔横向右书写。晚年茅盾视力下降，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仅有0.03，再加之身体衰弱，腕力不逮，渐已无法继续握毛笔写字。对于茅盾来说，这不过是形式上的变化而已，活到老写到老的倔强依然见出老派文人心底的几许执着。茅盾一生笔耕砚田，作品全集达洋洋四十二大卷，在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数量名列前茅，留存下一个著作等身的文学遗产和精神财富。展览虽有玻璃板相隔，观者却无不感到历久弥新的手札文本上墨香四溢，这些泛黄的手稿正如泛黄的书卷，历经岁月沉淀淘洗抹不掉的是一纸纸流芳墨韵，隽秀娟丽的字迹下是茅盾温文尔雅的风采和清雅不俗的修为。手写时代的结束令作家手稿愈见珍稀，引发今人对文字和文学的敬畏心。老派文人们的一笔一画，一字一句书写了历史，也留存了生机。见字如晤，展信舒颜，与作家的隔空对望，已使手稿有了不少动人诗情。

观展至此人们似乎忍不住也欲提笔写下几行字。展览很贴心地安排了互动环节，提供空白的仿古笺纸供观者留作感言。我看了张贴出的几页留言，大多写得意思真切却是興味寥寥，今人离手写信的年代已有几分疏离，竖行行文的风雅更是渐行渐远了。

后来，由于工作环境变化和年龄增长等原因，我渐渐疏离了儿童文学。没有再来巨鹿路675号。跟中由美子的联系也少了。令人懊恼的是我换了几次邮箱，失去了她的联系方式。她恰恰也搬了家。我曾有机会随团访问日本，很想与她见面，可惜未能联系上。

2019年3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张锡昌先生的电话，说中由美子找我，想询问作品版权的事情。随即，他发来了中由美子的邮箱，这样我们终于又建立了联系。令人意想不到的，她不幸患了癌症。这些年一直在跟病魔作斗争。她在邮件中告诉我说：“我曾于2007年得病住院后，一直没有出国过。现在又得了‘新病’，正在做放射线治疗呢。”她找我，主要是为了选编《世界的孩子们·杰作选》，书中收录了我的散文《十八双鞋》，必须弄清版权归属问题。她把自己的病历写得轻描淡写，编书出事的事却丝毫未肯马虎。事实上，她正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带病工作，身体健康仍不容乐观。可是我别无他法，只能抬头遥望星空，默默地送去由衷的祝愿与感谢。

10月初的一天，打开邮箱，从中由美子发来的邮件中，竟突然读到张锡昌先生逝世的噩耗，不由十分震惊。几个月前她还跟我相约，找时间去古镇周庄走走。他告诉我已经快八十岁了，但笑得很爽朗。没想到，一切是如此难以预料……

我注视着门墙上这块铭牌，用手机将它仔细拍摄。来自各方的一代代文学工作者在这里接力传承，这才是巨鹿路675号被称为文学圣殿的缘由吧？与此同时，她也介绍翻译家关登美子、画家津田棗冬、篠崎三郎等人，前来旅行写生。我陪他们分别去了古镇周庄和阳澄湖。古色古香的桥楼、粉墙黛瓦的民居、风光秀美的湖水，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一幅幅画面留存在了速写本上。很快，他们以江南水乡为题材的不少作品在日本发表。有的成为儿童文学作品集的插图。日方出版的《世界的子供たち》(《虹の图书室》杂志，则翻译介绍了大量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品。记得当时还出版过江苏作家特辑。

1990年11月，旅美画家陈逸飞回到上海，参加一部大型画册的首发式。16日，他再一次去周庄。同行者中，有张锡昌、陈丹燕和中由美子，以及张锡昌原先的同事、旅美画家王英浩。我在周庄参与了接待。陈逸飞特意带来一枚联合国邮政机构在日内瓦发行的首日封，赠送给周庄古镇镇长春春地，还挥笔题词“我爱周庄”。正是这次活动，我弄清了陈逸飞印在首日封上的画作，究竟是不是《故乡的回忆》(《双桥》这个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